职业教育国际化的协同创新机制研究

毕廷延[1]，刘莉[2]，刘文林[3]，李敏[4]，唐玉海[5]
1. 潍坊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潍坊；
2. 潍坊学院外国语学院，山东潍坊；
3. 潍坊学院美术学院，山东潍坊；
4. 潍坊学院教育学院，山东潍坊；
5. 潍坊科技学院文学院，山东寿光
DOI：10.62836/jer.v4n11.1540

摘要：职业教育发展到当下阶段，国际化是整体趋势和各方共同的选择。职业教育国际化，在最外层能够被直接观察到的部分，是国内职业类院校与市场主体共同推进的跨境办学相关业务。而职业教育国际化在内在层面的实质，属于各类参与主体之间既有利益格局的重新调适和利益分配。本课题所开展的研究，建立于协同创新的视角基础之上，课题组综合研判了政策层面的文本，整理了行业相关的调研报告，实地走访调研了具备代表性的案例单位，识别了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的推进过程当中，责任分担资源流转、标准互认维度协同失灵的具体表现特征，分析了这些特征背后所对应的生成诱因。课题组在这些前期工作的基础上，搭建了“契约共担—资源中枢调度—双轨适配”的机制优化路径，提出了行业仲裁联合第三方效能评估的配套治理框架。研究结果显示，解决实践当中长期存在的院校主动、企业参与意愿相对不足，各主体分散行动对外认证落地困难等问题，不能仅追加相关资源投入，还需要重塑协同运行的底层逻辑，要依托制度规范明确各方在责任上的边界，借助产权激励推动资源的有序流转，赋予输出标准适配东道国本土环境的弹性空间。

关键词：职业教育国际化；协同创新；产教融合

Research on th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Mechanism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Tingyan Bi[1], Li Liu[2], Wenlin Liu[3], Min Li[4], Yuhai Tang[5]
1.School of Marxism, Weifang University, Weifang, Shandong;
2.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Weifang University, Weifang, Shandong;
3.School of Fine Arts, Weifang University, Weifang, Shandong;
4.School of Education, Weifang University, Weifang, Shandong;
5.School of Literature, Weifa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ouguang, Shandong

Abstract: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has entered an in-depth development stage. Despite its outward manifestation as the overseas deployment of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enterprises, it essentially entails the

*基金项目：本文系高校毕业生就业协会高等学校国际合作与交流专项课题“职业教育国际化的协同创新机制研究”（编号：GJX25Z3020）研究阶段性成果。

reconfiguration of interest relations among multiple stakeholders. Drawing on policy documents, industry reports and fieldwork cases, this paper identifies the manifestations and underlying causes of collaborative failures in three dimensions: responsibility sharing, resource circulation and standard recognition. It further develops a mechanism reconstruction path characterized by contract-based responsibility commitment, centralized resource coordination and dual-track adaptation, and proposes a supporting governance framework integrating industry arbitration and third-party evaluation. This study reveals that tackling prevalent practical dilemmas including insufficient corporate participation, fragmented operations and ineffective overseas certification does not hinge on increased investment. Instead, it requires reshaping the foundational logic of collaboration: responsibilities shall be bounded by institutional rules, resource flows driven by property-right incentives, and exported standards reserved with flexibility for local adaptation in host contexts.

Keywords: vocational educ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1 引言

将职业教育国际化协同问题，拿来作为职业教育的一个关键问题加以讨论，源于职业教育在国际化发展阶段当中的现实转变。随着职业教育的深度发展和融合，阶段学界与实务领域已经形成基本共识，职业教育对外开放不再需要争论“要不要走出去”的价值命题，实践层面更加迫切需要回应如何稳妥推进以及拓展可持续合作空间等操作性问题。一个国家职业教育的海外布局，从来不是教育主管部门单独承担的事务，对外合作一端对接产业资本所具有的全球化布局，另一端关系到跨境技能人才在身份认同与职业发展上的需求。国家的政策规制、市场波动、文化差异，以及资质标准等多，重要素在合作链条当中相互交织，单一主体独立推进国际化项目，极易在跨领域对接环节遭遇阻滞，协同上的不足已经成为制约项目长效运行的瓶颈。

国内研究的概况。在政策层面，职业教育国际化具有的演进脉络，反映出研究重心从对外开放转向多方协同的变化，而2020职业教育国际化年教育部以及八部门印发《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首次将职业教育放到教育对外开放的重要位置，同步部署了“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升级以及职业教育对外输任务。2022年，修订实施的《职业教育法》，以法定形式确立政产学研用金多方协同的发展导向；2023年，出台的《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高质量发展》《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赋能提升行动实施方案（2023—2025年）》，将政策着力点落在多方联动机制搭建、资质标准互认以及产业需求深度对接等方向[1]。国家职业教育国家化政策导向的调整，使得职业教育对外开放的结构性矛盾有所凸显，协同体系在完善性方面的短板也逐步暴露出来。

政策在顶层设计方面的目标设定，和地方在落地当中的实践之间仍然存在落差，中国贸促会所发布的《2023全球经贸摩擦指数报告》相关数据显示，国内企业在海外投资上的规模年均增幅达到12%，产业市场对兼具技术能力与国际规则认知及跨文化沟通素养的复合型技能人才，存在40%的供给缺口。麦可思研究院《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2023）》统计结果说明，具备国际视野的高职毕业生薪资优势可达23%，而能够匹配企业在跨境经营岗位上需求的毕业生占比仅为15%，产业端对于人才的需求比较旺盛，职业院校在人才培养上的供给与市场需求有所错位，供需之间的结构性矛盾，直观体现出现有协同机制运行不畅。

当前领域内已有研究，在职业教育国际化推进所具有的时代价值和现实紧迫性方面，已经给出

足够充分的论证，所形成的共识也较为充足，本文不会对这部分意义加以重复阐释，而是将关注的重点放在实践过程当中的协同困境上，在政府与行业组织和企业及职业院校等多方主体共同参与的合作项目内，各个参与的主体为何常常独立采取行动，很难形成相互配合的合力，不同主体的权责边界在哪些具体环节出现了模糊的问题，资源层面的投入如何产生重复浪费的状况，向外输出的教学标准又为什么很难适配海外当地的实际环境，对于上述相关问题，本文依托政策文本的梳理工作以及行业调研的相关资料与跨境办学的典型案例，尝试对职业教育国际化协同创新的内在逻辑开展比较系统的剖析，完成针对协同机制的重构设计。

2 现实张力：协同困境的三重表征

根据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2023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报告》显示，我国当前在对外合作的领域当中存在诸多不容忽视的难题：职业教育国际化的进程当中校企之间在协同联结上的状态相对松散，企业参与国际标准研制、国际化课程开发以及海外实训实习项目的比例不足20%，不同院校之间资源分散的问题相对突出，60%的高职院校存在同类课程重复开发的现象，优质师资与数字化教学资源的共享渠道还没有成型，政府行业企业院校之间的信息互通有所不足，政策扶持落地与市场需求响应平均存在18个月的时间差，仅有35%的院校搭建起稳定运行的产教融合合作联盟[2]。以上调研所得的数据可以有力地说明，职业教育国际化协同体系当中责任资源标准的核心维度所存在的短板。

责任协同层面的困境。我国职业教育国家化多元参与主体在权责划分上的模糊状态，是政策落地的效果不及预期的深层诱因。例如，广西东盟学学院存在这个方面的问题。学校建设项目具备代表性，该项目当中企业实际参与的比重不足30%，政产学研用金六方协同的框架更多停留在协议文本的层面，缺少实质性的约束机制。合作单位之间的权责划分的模糊，直接催生“院校积极、企业观望”的现象，院校参与国际化项目主要着眼于办学影响力方面的提升，企业决策所遵循的核心依据是投入产出的收益。由于两类办学主体在诉求上的差异十分明显，缺少能够平衡多方利益的契约约束机制。再例如，山东班墨学院项目，曾经出现的权责纠纷，正是该类问题的典型案例，项目运行出现风险的时候，参与各方容易将问题归因于机制不完善，而现有框架之下没有明确的责任主体承担相应后果[3]。

第二，资源在协同层面所面临的困境。分散的资源布局以及同质化的重复建设，是协同机制失效所带来的最直观的资源损耗形式。广西山东贵州多个地区所推进的职教出海项目当中，同类型的国际化课程重复开发的比例达到60%，跨境教学相关的数字化平台接口无法兼容，信息类资源彼此相互分隔，形成信息孤岛。各地区累计建成接近20万条的多语种教学资源，在整体层面的利用率还不到40%。这类现象的成因并非教学资源的总规模存在短缺，而是跨区域与跨主体的资源流转渠道受到了阻碍。优质的师资力量实训场地以及双语课程资源分别归属不同院校和地方，缺少统一的调度枢纽来打通资源之间的壁垒，资源共享仅存在于口头约定的层面，难以落地推行[4]。资源的流通渠道不够顺畅，协同合作就很难脱离纸面层面的协议。

第三，标准层面的协同困境，对外输出的标准在本土化适配方面所出现的失效，属于协同体系当中隐蔽性更强的一类风险点，统计数据显示，我国职业教育的标准在东盟国家获得官方认证的比例仅在百分之二十五左右，企业参与相关标准认证的占比不足百分之四十，泰国电商课程项目的失败，是学界经常引用的一个案例，课程方案直接移植国内已经成熟的电商教学体系，没有结合当地以现金交易为主以及移动支付普及率偏低的市场环境加以调整，最终学员自主创业的存活率仅为百分之三十五，该案例说明，职教标准的出海不等同于教学大纲的外文翻译，标准的落地需要同时嵌入技术规范与本土文化规则，文化层面的适配设计，则常常在协同方案的设计阶段被忽略[5]。

3 机制重构：协同创新机制的分析框架

在对三类协同层面的困境加以梳理之后，研究

的重心就向制度方案设计的方向转移，我们需要依靠怎样的制度安排，来推动处于分散状态的参与主体形成足够稳定的合作链条，本文所提出的职业教育在国际化协同创新体系方面的建设，应当围绕权责划分和资源流转以及标准互认这三个维度完成转型，从过去依靠行政动员的模式转向契约化共担的模式，从各个主体独立开展的建设转向中枢统筹调度的模式，从单向的标准输出转向双向适配调整的模式。

3.1 协同责任机制：由行政动员转向契约共担

现阶段大多数对外合作项目在协同推进方面，高度依赖行政动员路径，主管部门下发相关指导文件，院校主动对接所需要的合作资源，企业的参与大多依托人情关系，该模式在短期可以推动项目启动，而长期稳定运行所需要的内生动力有所不足，化解“校热企冷”的难题，需要建立具备契约属性以及法治化特征的权责分配制度，契约化共担的核心思路，是依托地方配套立法，明确企业参与国际化办学能够享受的税费抵扣和项目优先支持等政策，将企业参与合作的社会责任转化为可预期的经济收益，山东省针对出海合作企业减免30%教育附加费的实践，提供了可参考的实践样本[3]，在此基础上，可以借助区块链存证技术留存各方履约记录，依托智能合约自动落实激励与惩戒措施，实现履约过程可追溯、权责核算清晰，当责任划分具备制度与技术双重约束，协同动力就不再依靠参与主体的主观自觉，而是依托契约制度保障，从根源上缓解协同动力不足的问题。

3.2 资源共享机制：由分散建设转向中枢统筹

资源在碎片化方面的本质属于协同领域当中的市场失灵现象，教学资源所具有的公共属性比较强，单纯依靠单个院校自发整合资源，很难取得理想效果，而因此需要由国家层面牵头搭建资源统筹中枢。本文构建“国家级平台—省级分中心—高职院校”三级资源漏斗运行模型，国家级平台负责汇集多语种教学素材和国际标准资源库，省级中心立足区域主导产业所具有的特征，对资源加以本地化二次调整，院校根据自身对外合作项目的需求，选取适配的课程资源包。这套模式能够减少同质化开发，压缩整体研发成本[4]。资源在持续流转方面还需要配套激励制度，利用区块链完成资源的确权，企业上传工程机械VR故障库以及核心技术教学资源之后，可以按约定分享后续培训的收益，资源开放从无偿奉献转变为收益共享。数字化平台互联互通，是资源协同所需要的技术底座，也是破除信息孤岛的基础条件[6]。

3.3 标准认证机制：由单向输出转向双轨适配

泰国电商课程项目当中所暴露出的问题，为标准协同建设方面的推进提供对应的启示，职教标准在国际化层面的落地，需要同时完成技术规则和本土文化规则的嵌入，而基于这样的认知，本文提出“双轨穿透式本土化”分析框架。技术维度上，结合东道国基础设施的水平对国内成熟技术标准加以适度调整，例如将依托移动支付的交易方案改造为短信验证支付模式，经过当地产业主体的验证之后，纳入国际资质认证体系，文化维度上，把当地宗教习俗以及消费偏好这类本土要素融入课程场景，经由本土企业试用评估和跨文化满意度调研之后，再大范围推广对应的课程方案[7]。

职业教育国际化认证流程遵循梯度推进的思路。参照以往的做法，学校应该依次完成企业试用认证、行业协会认证与东道国职业教育主管机构认证，优先保障标准契合本土产业的需求，再扩大推广的规模。学校只有同步经受产业实践与本土文化的检验，输出的标准才能真正落地，也有利于有效避开适配不良的问题。

4 经验镜鉴

推动职业教育国际化，固守于本土的经验做法远远不够，而要吸学习、借鉴、收国际的成熟经验。德国的职业教育国际化起步较早，经验丰富，是世界各国学习的榜样。德国在工业4.0战略框架下，统筹推进职业教育在数字化方面的转型；欧盟依托伊拉斯谟+项目，搭建跨国的职教合作网络，OECD、UNESCO对职业教育所具有的国际公

共产品属性的界定，为多元主体协同体系的建设提供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参考，直接移植域外的模式则存在相应风险。

推动职业教育国际化，国内摸索多年，也攒下了一些实打实的经验。鲁班工坊建了十来年，早就不是最初那个单纯往外输出课程的载体了，如今它把标准开发、师资培训、课程共建、国际传播这些都拢到一起，成了一个综合协同的平台；在传播上，也形成了意见领袖推广、研究中心、多元主体联动的网络化格局[8]。

协同相关工作在成效层面的好坏，最终要进入真实的跨境合作场景当中去接受检验，而泰国鲁班工坊所聚焦的制造类标准适配，属于已经发展成熟的试点区域，埃塞俄比亚东方工业园所探索的是新兴市场的合作模式，巴基斯坦中巴经济走廊项目则直面较为复杂的合作难题。这三处实践样本放在一起加以观察，能够说明一件事，评判协同机制所具备的实际作用，该看企业参与比例、海外毕业生就业率以及标准认证通过率这类量化指标，而不是拿项目启动规模和宣传声势当依据[9]。

5 治理架构：协同创新机制的落地保障

我国职业教育在国际化层面的协同机制，要实现稳定的运行，就要有相配套的治理框架作为支撑，本课题所构建的“地方政府统筹牵头—行业协会负责仲裁—第三方机构开展评估”这套协同治理体系，内在逻辑并不繁复，地方政府手中掌握着政策工具以及财政资源，适合承担整体统筹的职责，行业组织对产业运行的规则较为熟悉，对国际资质的规范也十分了解，开展纠纷仲裁有其所具备的专业优势。比如依托中国机电进出口商会设立跨境产教合作纠纷仲裁机构，把校企双方的利益矛盾从行政协调的流程当中剥离出来，第三方评估机构则承担效能监测的职能，选取企业资源开放程度和海外就业薪资溢价这类客观指标，替换主观性的评价内容，形成一把可复核可对比的协同成效标尺[10,11]。

这套框架在职业教育国际化治理层面所具有的核心价值，是推动权责以及资源和标准三个维度的协同从理论构想落成可以运行的制度接口，任何组织的责任都要靠制度条款形成约束，职业教育国际化也不例外。资源依托中枢调度与确权激励实现流动，标准按照双轨适配的思路完成分层认证，多方主体才有可能跳出各自单独核算收益的思维，结成协同共同体。同时学校也应当有所认识到，协同制度是动态演化的体系，不存在可以一直沿用的固定方案。职教出海正从零散项目模式转向常态化的制度安排，参与合作的国家与行业主体持续增加，协同创新机制还得依托实践反馈完成迭代优化[9]。

6 结语

职业教育在国际化方面的顺利推进，所面临的难点究竟存在于哪些地方，本课题所给出的研究结论显示，对发展形成制约的核心瓶颈不在资金投入的规模当中，而在协同运行的底层逻辑层面。权责划分一旦出现模糊状况，合作的秩序就很容易陷入混乱，资源流通一旦受到相应阻碍，协同工作就会流于表面的形式，标准适配一旦出现失效，对外合作的根基也会随之发生动摇。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只依靠政策文件反复发布号召不会产生实际效用，必须开展系统性的制度重构，依靠法定规则对各方的责任加以约束，依靠产权激励盘活存量的教学资源，对外标准适配本土的场景要留出一定的弹性，再配上行业仲裁以及第三方评估的治理层面保障。只有这样，职业教育的国际化才能摆脱分散推进的状态，形成系统化的联动模式，为国内产业在海外的布局输送适配岗位需求的技能类人才，最终形成一套经过实践检验具备自身特色的职业教育国际化中国方案。

参考文献

[1]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课题组.职业教育国际创新趋势探析：基于“八化”框架的系统解读[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5(12):5-13+54.

[2]马玉霞,王传礼,王新“一带一路”背景下职业教育“随企出海”的现实审视与优化路径[J].教育与职业,2025(14):57-64.

[3]林英.职业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时代意蕴、理想样态与

实践路径[J].教育与职业,2025(21):33-41.

[4]刘聪,阮晓文,何正英.我国职业教育境外办学的特征事实、现实问题及路径优化[J].中国高教研究,2025(5):93-100.

[5]曹祎怡,佛朝晖.创新扩散理论视角下职业教育“走出去”：国际经验与本土化启示[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6(16):43-52.

[6]段世飞,吴倩.数字化赋能职业教育国际化：逻辑动因、演进特征和实践路径[J].职业技术教育,2025,46(7):12-19.

[7]何正英.新时期我国职业教育标准“走出去”：价值向度、实践样态与突破路径[J].职业技术教育,2025,46(7):26-30.

[8]王岚.中国职业教育国际传播研究——基于全球“鲁班工坊”的分析[J].职教论坛,2026,42(4):44-53.

[9]江小华,宁艺,王维军,等.“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坦桑尼亚职业教育合作的演进逻辑、现实挑战与路径优化[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6(16):31-42.

[10]刘一展.建设世界重要教育中心：职业教育国际化高质量发展的逻辑与进路[J].职业技术教育,2025,46(28):65-72.

[11]杨素萍,陈玉婷,朱晓玉.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国际合作高质量发展研究——“一带一路”倡议下典型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J].教育与职业,2025(21):50-57.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Global Science Publishing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